

近年德语人文社科作品译介:

经典不断重译,仍有拓展空间

□ 钜 文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总被人挂在嘴边,在这一进程中,西方思想的译介和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历了一段不正常的封闭期之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国思想文化的译介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各种来自西方的新思潮(其实本身未必是最新的,但对隔膜已久的国内知识界和文化界而言仍然是“新潮”)席卷中国。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卡西尔的《人论》两本并不算通俗的学术著作在当年的销量,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天文数字。

因为职业和个人兴趣,笔者一直对德语著作在中国的译介颇为关注。德国思想文化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由来已久,其影响之深远有目共睹。近些年来,对德意志思想资源的推介之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本文试图简单勾勒德语人文社科著作在当代中国译介状况,囿于篇幅和个人眼界,不可能面面俱到,希读者和行家谅解。

德意志“盛产”思想家,他们对人类精神史的贡献巨大。中国学术界也一向推重德国思想,对古典大师的研究和翻译不遗余力,他们的一些重要著述很早就被引进中国,如黑格尔、康德等。近些年,学界启动了一批“重大项目”,重译经典。李秋零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已于5年前完成,邓晓芒和杨祖陶也重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而篇幅更大的《黑格尔全集》翻译工程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有规划,但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最近商务印书馆又重新启动了该项目。而在之前,人民出版社也开始了另一套《黑格尔全集》(所依据的底本与前者不同)的翻译工作,部分卷目已经以单行本的形式面世。

孙周兴目前正在主持翻译《海德格尔文集》,计划出版30卷,他同时也是正在进行之中的《尼采著作全集》的重要参与者。而另一部《尼采译疏集》事实上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尼采全集》,所不同的是,《尼采译疏集》系列中除了尼采本人的著作外,也将国际学术界有代表性的经典研究文献纳入其中,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这两套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和读者的极大关注,与之相比,另一套《尼采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则鲜有人关注,目前也只出了三卷。由此看来,德国经典哲学著作的翻译和重译方兴未艾。笔者推测,在不久的将来,谢林、费希特、叔本华、狄尔泰、齐美尔等人的大型文集或全集中文译本也将陆续问世。

不仅是上述“古典”大师,德国20世纪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家的著作近年来也被陆续介绍到中国。这些著作之所以被

翻译成中文,除了自身的学术价值外,国内的意识形态状况及学者自身的旨趣也是重要的原因。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阿多诺、霍克海默,第二代的哈贝马斯,第三代的霍耐特等人的代表作都是在近一二十年里被译成了中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说起哈贝马斯,我想起前些年随着他的作品进入中国,国内学界对他特别关注。在访德期间,我先后结识了几位德国社会学研究者,请他们谈谈对哈贝马斯的看法。他们的答复颇为一致:在社会学家的眼里,他是个哲学家,在哲学界,他被认为是社会学家,但没有人怀疑他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而卢曼则是德国学界公认的社会学大家,但是中国国内对他的译介很少。即便是知名度不亚于哈贝马斯的阿多诺,其大部分著作都没有被译成中文,个中原因很多,作者学问渊博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试想,如果译者没有哲学、社会学、美学、音乐学的背景,如何能准确理解并翻译他的《音乐社会学导论》。

另外一位是战后重要的思想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布鲁门伯格,前不久他的《神话研究》中译本问世。我猜此书的出版有各种因缘巧合,因为并不是他影响最大的作品。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其接受程度和作品本身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并不一定相称,这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与此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本雅明作品系列、舍勒作品系列正在陆续问世,而我也更期待阿多诺、卢曼、埃利亚斯、布洛赫等人的作品能够陆续译成中文,以一种比较完整的形式与中国学界和读者见面,相对于名著重译,我个人觉得,重要作品的首译更有价值。

笔者对德国历史比较感兴趣,不妨也略陈己见。德国通史、断代史类的译作在国内有一些,规模最大的当属《德意志史》(商务印书馆,4卷8册)。但是这套通史成书年代较早,已经不能反映最新的德国史研究成果了,而且由多人合译,译文质量有些问题。近些年,德国史学界推出了好几部质量上乘、集大成式的通史,至今未见有中译本问世。除此之外,国内还出过几种单卷本的德国通史、断代史类译作,但大多数是英美学者的作品,水平也高低不一。并非说非德语作者写作的德国史就一定水准不高,问题在于,从学术背景来看,这些书的译者多出身世界史或英文专业,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或细节时,由于缺乏对德国文化的总体认识或者对德语的掌握很有限,容易导致误解误译。而考察现有的这些译本,这方面的问题的确不少。

就题材而言,还有一个现象颇值得注意。在德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内出版界和读者似乎对纳粹德国和二战这一阶段特别感兴趣。相关作品很多,大多为英美人所写,但翻看一下有关希特勒和纳粹军官的传记作品,发现其中不少书的历史观也很有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德国近现代的史学非常发达,名家辈出。但是他们的大多数经典著作迄今都没有中译本,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最近听说,有一些年轻人有志于做这方面的工作,说服出版社推出一批作品,例如兰克、特赖奇克、蒙森、布克哈特等人的史学著作。当代德国也有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史学家,他们的著作被零星介绍到了国内,例如科卡的《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相比之下,他的英美同行伯克、达恩顿已经有多本著作被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国内对德国史学缺乏足够的认识,加之德语译者难寻,是重要原因。

最后说一说笔者比较熟悉的文学类作品。相对于英语、法语、俄语、日语文学而言,德语文学在普通读者中的认可度并不高。这并不等于说德语作家和作品的知名度不高,比如歌德、席勒、托马斯·曼等大家,很多文学青年都知道,但一说到阅读,就望而生畏了。德国文豪莱辛曾说过:“哪个人会不称颂克洛卜施托克呢?可是谁会去读他?不!我们不要受人尊崇,我们要人们好好读我们的作品!”德国文学向来被认为思想性强,可读性弱。这种看法未必错,至少说出了部分事实。

所以在诸多的德语文学作品中,可读性强的在中国的传播就比较广泛,茨威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不仅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大概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受欢迎的德语作家之一。但是在德国也有这样一个现象:太受读者欢迎的作家和思想家,学界往往会看不上。学者喜欢的是有“深度”的作品,例如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布洛赫的《梦游者》、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等。在德国大学,如果学生跟导师说想以茨威格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大部分导师可能会以“异样”的眼神暗示他的不赞同,或者干脆毫不客气地否定这个选题(当然做茨威格的接受史研究则另当别论,因为这可以算作是一个具有“学术性”的题目)。亨利希·曼的作品也是类似情形,至今在德国仍不乏读者,但却为学院派所轻视。他的重要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然而今天也鲜有人问津了。

黑塞也是一个有趣的个案。早年间,他的作品也是不为学术界重视,因为不少作品的题材跳出了西方文明主流的



框架,充满“东方情调”。然而随着《荒原狼》等几部作品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还被拍成了电影,黑塞才逐渐为德国文学研究界所重视。为什么黑塞显得“另类”呢,因为他是一个“失败者”。他辍学后,当过学徒和售货员,最后自己写作。写作之余,爱在自家院子里打理花草,把自己晒得黧黑。他对东方哲学很感兴趣,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中国、印度哲学的东西。传统的德国学者带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眼光,看不上东方的智慧。但一次大战结束后,西方没落的预言似乎应验了。在人们开始反思西方文明之时,作家这些带有东方情趣的作品就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黑塞作品中的许多元素颇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所以其作品在国内颇受欢迎,有众多译本。市场上有三套规模比较大的黑塞作品集,分别由上海译文、上海人民、上海三联三家沪上的出版社推出。不久前,译林出版社黑塞作品集也陆续面世。这样的“热”绝非偶然,对于出版社而言,有销售预期才会这么做。看来,黑塞对中国读者仍然具有吸引力。

对于中国德语研究和翻译界而言,有一则消息引发了圈内人持续的热议: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茂平将主持翻译《歌德全集》,其工作底本为德国的法兰克福版《歌德全集》,是当代最权威的歌德全集之一。译作规模预计在3000万字左右,约40卷至50卷,其中有大量内容为新译,值得期待。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德语界最大的翻译工程。编委会的目标和定位是“做成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全、最权威的《歌德全集》评注版汉译本”。歌德是与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人比肩的文学巨匠,但其无论从传世作品的规模还是体裁的多样性而言,歌德作品的翻译难度无疑要大于其他各位。

我最近在读王茂平的散文集《新腔重弹旧调的余响》,其中收录了一篇文章,提及他很早就考虑将歌德著作全面译成中文。上个世纪,日本有两套完整的歌德作品全集,而同期我们只有几部作品的汉译本。直到上世纪临近尾声时,两套规模中等的《歌德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0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4卷本)才姗姗来迟。一旦《歌德全集》竣工,对于国内绝大部分不懂德语的读者来说,可以借此重新认识歌德,有机会去阅读很多之前没有阅读过的歌德文本,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对于国内的人文学界而言,这套作品也会有很高的价值。

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对德国经典作家作品的译介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像《席勒文集》(5卷)、《海涅全集》(12卷)、《卡夫卡全集》(10卷)这类大部头的出版,为中国读者和研究者全面理解这些作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继《布莱希特戏剧集》(3卷)出版15年之后,另一套《布莱希特作品系列》日前也陆续问世,主要收录作家戏剧之外的其他重要作品。这体现了一种趋势,经典作家的译介正在向纵深发展。20世纪其他一些著名作家的重要文本也都系统地译成中文,例如《托马斯·曼文集》《君特·格拉斯文集》以及伯恩哈德作品系列、彼得·汉德克作品系列等。

还有一个在国内出版市场上具有共性的现象:一旦某位当代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就会被大量介绍。最近两位获奖的德语作家是耶利内克和赫塔·米勒,这两位此前还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女作家的作品被很快译出,随即陈列在书店。检视译文后便会发现,问题真是不少。出版界的急功近利绑架了译者,坏译文伤害的不仅仅是读者,更重要的是

作者本人。

与此对照,那些并非热点、却重要的作家作品更值得出版界和译者垂青。《德国浪漫派文学丛书》《当代瑞士文学丛书》这类译丛,《毕希纳全集》《克莱斯作品集》《诺瓦利斯文集》《巴赫曼作品集》这类作家选集都是值得称道的积累性工作,读者可以借此了解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地域或作家,加深对德语文学的认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玉书创立的《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迄今已出8卷,选译了诸多之前从未译成中文的德语文学作品,功莫大焉,希望这一刊物能够继续下去。

在出版界和译者的共同努力下,一些以难译著称、在世界文学中享有盛誉的德语文学杰作也在近几年与中国读者见面,例如《一个没有个性的人》(穆齐尔)、《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德布林)、《浮士德博士》(托马斯·曼)。据说诸如《维吉尔之死》《梦游者》(布洛赫)也正在翻译之中,这些都是很值得期待的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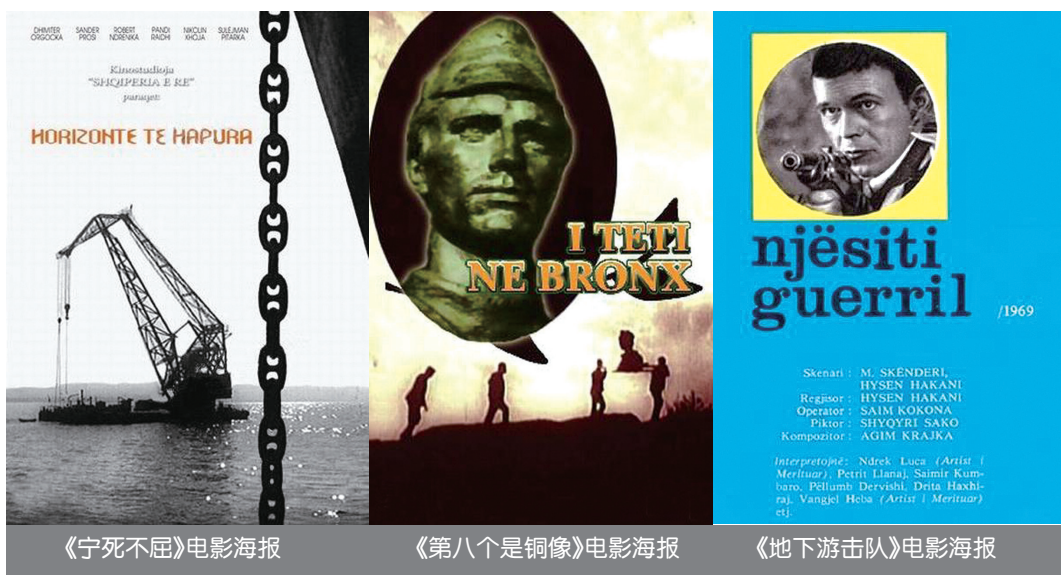
最近十多年,德语诗歌的翻译呈现了一个新高潮,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策兰等重要诗人的作品被系统地翻译,某些诗人的作品甚至先后出现了多个选(译)本。此外一些不太为国人所熟知的德语诗人的作品也有了汉语读本,《傅立特诗选》即是一例。而《荷尔德林后期诗选》的出版则标志着研究型的诗歌翻译已经出现,且起点非常之高。

综上所述,德语人文社科著作的中译工作在近些年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尽管如此,仍有很多在德语思想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品至今尚无汉语译本。这既是遗憾,也是对学界、出版界、译者的激励和鞭策。我们期待着更多、更好的译作出现,无论是对于中国的学术发展还是对于读者而言,都将是一件幸事。

二战后阿尔巴尼亚电影:

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赞歌

□ 郑恩波



在阿尔巴尼亚的历史上,最让人民引以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15世纪中叶伟大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领导人民同强大野蛮、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的长达25年的斗争;另一件是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全国军民同意大利、德国法西斯进行的5年7个月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这一战争不仅使阿尔巴尼亚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赢得了民族自由、国家独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也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战争期间,意德两国先后向阿尔巴尼亚派遣了70万侵略军,不到100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同占领者展开生死搏斗,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死、打伤、俘虏了7万意、德法西斯侵略者,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诚然,骁勇顽强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为取得战争胜利,也做出了巨大牺牲,付出了惨重代价。按人口计算,阿尔巴尼亚在二战中遭受的损失,是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国捐躯的烈士就有2.8万名。

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既在阿尔巴尼亚历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同时也在人民心中留下一块难以忘却的伤疤。了解这一点,便可以明白为什么

半个多世纪以来,阿尔巴尼亚的文艺创作中,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一直是最受重视的题材。这一情况在电影尤其是艺术片的制作中更为突出。在近40年的时间里,阿尔巴尼亚共拍摄了170部艺术片,其中反映民族解放战争的占总数的1/3,其中《地下游击队》《海岸风暴》《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亡军还乡》《绿树葱葱群群山》《最后一个冬天》《战斗的早晨》《墙上的罂粟花》《战争中的音响》等都是思想深邃、艺术精湛、影响广泛的佳作。

《地下游击队》是根据游击队员出身的老作家斯坎德培·亚萨的长篇小说《游击战士》改编摄制的。全片有两条线索,一是几个地下游击队员在一位老练的共产党员领导下,在敌人的眼皮下从容不迫地处死了叛徒,从敌人手中夺得武器,救助“政治犯”越狱。另一条线索是打入敌人营垒中的中尉佩特罗与敌人斗智斗勇,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影片情节跌宕起伏,颇具经典惊险片的韵味。

《海岸风暴》是著名剧作家苏莱伊曼·皮塔尔卡根据自己的名剧《渔人之家》改编拍摄成的电影。皮塔尔卡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的宏大叙事,在一个渔民家庭里严整有

序地展开。作者细针密缕地勾勒出老渔民姚努兹及家人同以其长子谢里木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尖锐斗争,从而展现了波诡云谲的战争风云;赞颂了小儿子彼得里特及其父亲姚努兹为代表的阿尔巴尼亚爱国者不畏强暴、勇于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崇高气节。影片激荡着一种激动人心的革命正气,其有一个场面如同浮屠一般留在观众的记忆中:刽子们包围了姚努兹的家,逼着他交出革命者马里奇,紧要关头,小儿子彼得里特化装成受伤的马里奇出现,姚努兹大声吼道:“只要我活着,你们永远也别想把他拉走(指带走马里奇),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姚努兹老人的吼声和雄姿展现了阿尔巴尼亚人民最本质、最可贵的民族性格,《海岸风暴》也因此具有了永恒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宁死不屈》是一部奇巧、别致的影片。剧情很简单:两位年轻的革命女战士米拉和阿菲蒂蒂不幸被捕,落入德国法西斯的魔掌。盖世太保的头子汉斯·翁·斯多尔兹软硬兼施想让两个姑娘投降。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不渝使她们战胜了严刑拷打,为了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影片没有展示刀光剑影的战斗场景,而是细腻入微、精雕细刻地描绘两位女英雄在生死考验面前的心理活动,竭尽全力去表现她们美丽的灵魂和绝对压倒敌人的精神力量。该片是根据阿尔巴尼亚家喻户晓的“人民英雄”布莱·娜伊皮和佩雷塞芬妮·科克蒂蒂的革命事迹创作的,具有天然的亲切感和鼓动力,再加上英雄城记诺卡斯特细腻、坚硬的多彩石头作为故事背景,凸显了两位女英雄坚强刚烈、宁死不屈的品格。优美动听的音乐和插曲,也为影片增色不少。

共产党的领导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民族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描写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都涉及到共产党员形象塑造的问题,但把共产党员作为中心来塑造的作品并不多,作家德里特

洛·阿果里的长篇小说《梅莫政委》是人们公认的最富有影响的代表作。小说发表当年(1970年),就由作者改编成电影,取名《第八个是铜像》。影片结构灵活而不松散,采取倒叙、迂回推进的方式编织故事。它通过七名战友的回忆,将梅莫·科瓦奇的故事一一道来,从中既可目睹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的风云,又可真正认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中的领导作用。阿果里注重并擅长塑造人物形象,影片中政委梅莫·科瓦奇、营长拉波·塔班尼、医生波洛沃三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特别是波洛沃医生从对革命采取中间立场到全力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的转变过程,描写得细腻、真实,是阿尔巴尼亚银幕上著名的艺术形象之一。

著名作家、第一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获得者伊斯科·卡达莱的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已成为世界文学经典。根据这部名著改编的故事片《亡军还乡》选材稀罕,主要人物心态变异、结构玄奥、结尾奇妙。作者以战败国意大利的一名将军领着一个神甫到阿尔巴尼亚搜寻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的遗骸为主要情节线,将自己童年时代听说过的故事、传说巧妙地编织起来,向观众展示了人民群众坚强不屈的英雄气概、对待战败国军人既严肃又有人情味的大气、战败国将军的狼狈丑态和晦气。影片人物不多,但每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绪都被演员表达得淋漓尽致。

白天出不去就夜里送,踏着没膝的雪,艰难地攀登在陡峭的山岭上、树上。抒情与诗化是影片的主要特色。优美的画面配上天才作曲家亚历山大·拉洛谱写的民族色彩鲜明的音乐,使影片成为一部雄壮、奔放、激越的交响诗。

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是全民参与。因此,电影工作者也关注到少年儿童在战争中的作为,共拍摄了十多部反映小游击队员、小地下工作者战斗生涯的故事片,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战斗的早晨》《墙上的罂粟花》《战争中的音响》等。

影片《战斗的早晨》富于童稚童真,真实有趣地描绘出古利、皮洛亚、米罗雅、托米4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同富翁之子戈尼从一起玩耍到受到不同阶级意识的影响逐渐疏远乃至最后分道扬镳的过程。影片的重心放在4个孩子出自对侵略者的仇恨,自发地劫取两个在湖里游泳的德国兵的武器这件事情上,剧情的发生自然、轻松、可信,将深刻的革命道理蕴藏在开心的微笑中。

如果说《战斗的早晨》展示了孩子们奋起斗争的一面,那么,《战争中的音响》则展示了革命的人情味。穷苦的孩子巴尔迪失去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他的舅舅、海港工人塞利木介绍他到商人加利普·斯背姆比家里做杂务活儿。巴尔迪非常喜欢音乐,随身带着一个笛子,劳动之余常常吹奏。加利普为儿子纳尔迪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他拉小提琴。家庭老师埃切莱姆是个有心人,发现了巴尔迪的音乐天赋,让他与纳尔迪一起学习。富翁加利普也受到感动,默许巴尔迪与儿子一起学习。原来埃切莱姆是一名共产党员,负责在群众中发现、培养音乐人才。在埃切莱姆的辅导下,巴尔迪很快成为优秀的小提琴手。影片结尾,他已经能为游击队广大指战员演奏游击队歌曲和世界名曲了。影片着力阐释了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就开始注意发现人才、为未来培养人才的理念。